

悦习隳粤隳 礲砢砢砢砢砢砢
栽藻则戴排土管舞甬而渠甬甬甬

摇〔美〕马克·赛尔登(配乐影碟建议)摇著
魏晓明摇冯崇义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 辕美) 马克·赛尔登著 魏晓明 冯崇义译 圆原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圆原圆圆

摇(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摇陽昇苑原惠武源原蓮園原員

摇Ⅰ 郢 鞞...摇Ⅱ 郢 ① 马... ② 魏... ③ 冯...摇Ⅲ 郢 新民主主义革命
原研究 原中国摇Ⅳ 郢 ④ 苑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第 号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摇摇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著译者：〔美〕马克·赛尔登（译者：陈永发）

译摇摇者：魏晓明摇冯崇义

责任编辑：武摇英摇罗摇琳摇光摇知

责任校对：同摇文

责任印制：同摇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缘号摇电话 远缘怨怨远遥邮编 员园园德)

网址：www.163.com

经摇摇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摇摇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摇摇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摇摇本：愿忽伊灵源毫米摇摇圆开

印摇摇张：员缘缘缘

字摇摇数：圆忽千字

版摇摇次：圆园圆园年猿月第员版摇圆园圆园年猿月第员次印刷

陽月苑原惠源惠源惠源惠源·園特搖搖搖搖定價：圓圓圓元

摇摇摇摇摇版权所有摇摇翻印必究

悦习粤隳碓砑的猛排隳隳：栽耘再耘粤宰粤再碓砑祭戮阙

遭曾云则果乃藻造藻土

悦素匪吾果© 员怨缘遭曾退肆降葵葵， 附遭

经美国 酉肆肆陈葵葵， 附遭许可据 员怨缘年英文版译出

目摇摇录

前摇言.....	员
第一章摇陕西省：革命的环境.....	怨
第二章摇西北的反叛和革命者	圆苑
第三章摇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员怨猿缘~员怨肆年 陕甘宁苏维埃	愿袁
第四章摇新民主主义在 员怨肆苑~员怨肆愿年的陕甘宁边区	员圆圆
第五章摇危机与对新秩序的探索.....	员猿猿
第六章摇延安道路.....	圆苑
结摇论.....	圆苑
后摇记.....	圆苑
参考书目	猿猿

阅读中国序

刘摇东

摇摇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

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

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摇东

圆园园年 员圆月 员愿日于北大草庐

前摇摇头

这本书的初版是新一代关于革命中国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使用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档案文件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提供了第一批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和社会，另一方面从国际力量两方面探讨地方的革命进程；本书还从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革命变革中的创造性和民粹主义来源。

这本书还是 1970 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它受到当时全球重组和新思维的影响。从 1949 年前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从东南亚到全球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等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的冲突，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没完没了的斗争之中。那些斗争形成了美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

1976 年，当我为最终完成《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资料研究时，中美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时分裂力量形成，不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要求公民权利、反战及

新的左派运动。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似乎正在瓦解。美国在越南失败后不久，其霸权力量节节下降，中苏联盟瓦解，这一切为突破中美关系研究，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摇摇

时间在向前进，甚至是迫使我们忙于研究新的问题。我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 15 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那些殖民侵略者的神力，足以使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取得胜利。特别吸引我的是，广大抗战力量的先锋有没有可能在贫穷而屡遭蹂躏的乡村创造性地致力于解决贫穷、不平等和落后问题，这些正是现在后殖民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人民如何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怖的枷锁，他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为有力的行动，如何发展人类的自由和美好前景？人类如何站立起来？”那时在另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革命力量正在对看起来无敌的侵略者予以致命一击，使美国，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和理性生活陷入危机之中。

到 1945 年，在美国封锁、敌对并寻求孤立中国，把她作为国际弃儿 15 年之后，两个国家开始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重新确定全球敌对和联盟的版图。这些过程有益于重新反思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长期的中国革命。《延安道路》发表于 1945 年，正值中美关系向正常化大步迈进的时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戏剧性转变的时刻。

在我着手准备为这本书增加批判内容时，中美关系已经度过了 15 个喧嚣的年头。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市场、个体和外国资金的流入——尽管是以隐蔽而复杂的方式，毛的遗产还是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事业。从 1970 年代，邓小平的中国出

现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已经将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问题转变为最基本的平等问题。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出版本书，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35~1945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在1935~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团结了广泛的社会阶层。正如第一版的结论所指出的，“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进程与战时统一战线协调在一起的能力，从而领导一个大胆的，有创建性的解决农村的压迫和解体问题的运动，这正是‘延安道路’的特点”。民族主义和改革的联合，建立在党把不同社会阶层联合在一起的能力上，获得他们的支持，才有能力最终战胜日本并打败以美国为靠山的国民党。

中国的抗战力量是先锋队，并且在许多方面对这个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最有影响，它预兆着这个运动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亚洲和非洲，并最终改变全球政局。而这个集中于单个根据地共产主义斗争的研究，构成了广泛而彻底研究1935~1945年战争和革命的框架，在这场战争和革命中有1000万~

四千万人丧生，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①。我和许多其他学者在过去四十年间的研究，使得现在大量关于根据地的更为权威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些根据地成为战时抵抗运动的焦点，也是讨论国际样板的范围所在。

本版《延安道路》在第一版之后，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及其与革命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道德—经济—理性—农民的争论；关于党—以农民为中心—以革命变革为中心的观点的争论；以及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分类观点的争论。在新的结论一章里，我就这些问题和其他观点，对抵抗时期的革命变革和农村发展进行了评论。

我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延安道路”这一比喻，但它们又是整体相关的。它首先特别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从我在这里的详细描述，可以发现陕甘宁边区战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核心特征，在那些全面战时政府的敌后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根据地，带有重要的地域性变化。简言之，陕甘宁既是可以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微观要塞，又是深刻影响以后中国共

① 易劳逸（*葛罗特·费正清*）：《*民族主义中国*》，摘自黄正清（*费正清*）和费维恺（*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 1 卷，第 10 页，剑桥，1970。类似的数据引自威廉·科比（*辛克莱·刘易斯*）《*中国战争经济*》，摘自詹姆斯·孙（*费正清*）和史迪文·莱文（*费正清*）《*中国痛苦的胜利：民族主义与日本之战*》，第 10 页，纽约，1970。然而，战争并不仅限于 1937~1945 年。最好理解为从 1937~1945 年的 8 年战争，从某个角度而言，它是从 1937~1945 年的 8 年战争。在 8 年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几乎肯定超过了 4000 万，绝大多数伤亡人员是市民。

产主义事业的地方。对于所有在封锁地区自力更生的根据地，以及对于所有与它们不同的根据地，都具有普遍的重要特征：组建抗战力量，解决广泛存在的农村脱困问题，对付经济封锁和进攻，以及重建党、小农阶级和地方精英之间必要的关系等。新的民主和群众路线从理论上为地理上分散的战时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抗日事业中，延安的观念充分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高级领导的许多特征。从十几个根据地的这个时期的经验中总结出的教训和遗产，后来在人民共和国的复杂矛盾中贯彻始终，这些我将在后记中探讨。

《延安道路》不仅关注中国革命战争，而且关注 20 世纪革命变革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发展。“延安道路”强调创新特性，它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外国统治的瓦解问题，提出了中国以及大批后殖民农业国家面对发展的挑战适当开展战时团结的必要性，原版对西方中国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对 20 年代流行的对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它打破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盲目仿效的观点；打破了把外部来源问题看成是社团组织和技术扩散的现代理论；还打破了把群众的民族主义与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分离的观点。

新版《延安道路》体现了原版是在确信分析研究的核心要素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完成早期统计及增加和修改事实的严肃态度。然而在新版的前言和结论中，特别是在扩充的后记中，我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原版中的核心问题，并重新评价了我自己根据普遍的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革命变革的选择前景所做的解释。我还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复杂的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格局重新排列的情况，简要考察了早期的结论，根据我自己和其他人后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延安道路》

以及农村革命动力研究^①。

在后记中，我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最重要的是，通过回顾 1957 年代反右运动，1957~1976 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及 1957~1976 年代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我探究了如大跃进饥荒和文化革命的政治警惕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悲剧，是否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追溯到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道路”。所以，后记提供了一个评说“延安道路”和后来中国曲折事业之间关系的场合。

《延安道路》一书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 1937 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天。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对单个地域的研究，适当关注它的社会生态、人口统计、阶级、文化和其他特性，并不意味着假定每个根据地的条件都相同，更不意味着根据地代表着国家的条件。实际上，根据地占据着各省边界的多数崎岖不平的地域，远离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然而高度自治的民族运动的个别地区不断联系起来。

本研究追溯到持久的社会经济瓦解的起因，它是陕甘宁地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转译自弗里德曼*）、毕克伟（*转译自毕克伟*）和马克·赛尔登（*转译自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新港，1978；马克·赛尔登：《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纽约，1982。

区猿年革命冲突的前奏，其战时首府延安，象征着缘~缘年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年里，运动从中国社会周边的二次军事胜利形成一种平衡直到统治和改变中国。我希望通过考察这个农业地区在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力量传达一种强烈而典型的革命变革，并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让我们从陕西社会的瓦解和极度绝望所引发的最早的隆隆革命惊雷开始，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秦朝曾在此建立第一个统一王朝。两千年过去，这个地区将孕育一个新的革命中国。

第一章 摇陕西省：革命的环境

据特德（鄧德）说：“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1911年前的回民起义（回亂）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地躺着。”^①

关中地区将陕西省一分为二，它位于该省中部富饶的渭河平原上，两千年前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摇篮。关中易于防守，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她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从这里向外辐射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帝国^②。

有三个主要朝代是从这里兴起的。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屡屡作为帝国首都，成为中心象征而放射光彩。但是一千多年以前，关中地区开始衰落，虽然在唐朝（公元618~907）长安仍是一个傲视全世界的大都会。由于经济和政治势力转向繁荣且人

① 特德（美国社会学家）：《在华二十年》（载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档案号：RG226，卷号：100，页码：1-2）。特德是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总规划者，我感谢约纳丹·斯宾塞（美国社会学家）提供此段引文。

② 有关关中在中国文明中的重要性，见（英国）地理手册丛书，《中国本部》（悦春亭译）第1卷，第57页，1908，1909。

口众多的水稻生长地带——华南和华中，一个解体过程便开始并持续到 20 世纪。

黄土高原横亘中国华北和西北 远个省份，广逾 40 万平方英里，关中就处在心脏地带^①。那是一片梦幻般的黄色世界。19 世纪德国旅行家巴隆·冯·李德芬（Baron von Leffner）对此有生动的描绘。穿越渭河平原时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黄土。我们正是在黄土地带中心。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朦雾”^②。肥沃的黄土能够保持湿度，提供了中国农业最初发展的环境。旱地作物如小麦和谷子适于在平坦的浅黄色的土壤上生长，但是少得可怜而又不可捉摸的雨量，严重影响了财富生产能力^③。

从渭河平原北行到延安，这位旅行家进入人烟稀少、崎岖难行的黄土山地。这里，在陕北长城以南，黄土的其他特性导致了该地区的困窘状况。这里在 20 世纪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农村。由于森林和黄土本身长期遭受侵蚀或被人类破坏，它的陡峭山地使农业收成微薄且前景不稳。1928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样描述道：

① 乔治·克莱茵（George Klein）：《中国地貌及其人民》（The Geography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第 1 页，纽约，1928 年。

② 巴隆·冯·李德芬（Baron von Leffner）：《巴隆·李德芬书信集》，第 104 页（1928 年）（巴隆·李德芬书信集，第 104 页）。引自乔治·克莱茵（George Klein）《五亿人口的国家》（The Five Billion People of China），第 104 页，纽约，1928 年。

③ 克莱茵：《中国地貌及其人民》，第 104 页。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又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皱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看起来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①

更重要的是陕北地区地处偏远和交通不便，决定了这一带黄土高坡恶劣的生活条件。乔治·克莱茵（George Klein）描述黄土地区交通困难特别切合陕北的情况：“一个人如果不顺道路走，许多黄土地区就是不可穿越的。这些道路形成此地农村特色之一。每过一辆车或一群动物，就搅起黄土。黄土如此之轻，可轻易升入云中。由于持续的水土流失，一些路或小径变成了真正的峡谷，宽度仅够一辆车通过，几乎像矗立的墙，高耸达源英尺以上”^②。由于路少，许多又经常被冲坏，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贸易和交通以及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交通，是最原始和零星的。几乎无一例外，交通运输仅限于用牲口驮着物品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①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第源页，纽约，员苑。

② 克莱茵：《中国地貌及其人民》，第员页；参见《中国本部》，第员页。